齐柏平｜学堂乐歌对中小学音乐教育之影响

学堂乐歌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在外国列强凌辱中国、践踏中国主权、要将中国瓜分之险象环生的情况下产生的，带有极强的“被迫”色彩。清政府不得不采纳一些贤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知识，以发愤图强，免于亡国。因此，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在新式“学堂”里开设“乐歌”课；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再次重申1902年新式教育制度的精神，表明了清政府要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开设乐歌课，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知识的决心。随后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此后举国再无举人。全国开始大规模兴建新式学堂，普遍开设乐歌课，并基本上采取“近采日本，远法德国”的方针开展新式教育活动。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腐朽没落日益显现出来，虽然进行了“洋务运动”，但终归无力回天,“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赔款白银二亿两，割地若干。广东的康有为组织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旧式书生1300余人举行“公车上书”，要求光绪皇帝采取“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政策对付日本及列强，未能得到满意答复。1898年的“戊戌变法”又失败，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才不得不采取“新政”,于是有“学堂乐歌”出台。最初乐歌课是选修科，也称“随意科”，半课时，1912年以后变成必修科，一课时，并开始借用日本和欧美曲调进行选曲填词式的“创作”。经过多年乐歌学习之后，中小学的音乐教育系统已然建立起来，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论述中分析其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影响。

**一、学堂乐歌对中小学校音乐教育之影响**

**(一)学堂乐歌中的简谱之影响**

学堂乐歌是“新生事物”，当时的官民都不知道乐歌（即现在的乐理）为何物，当然也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也就是它的操作规则。怎么歌唱？怎么记谱？这些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但既然要开课，一没教科书，二没教法，三无教师，那怎么上课呢？所以，只有让国家公办的最高学府高薪聘请外国洋人来教唱乐歌。中国政府在20世纪初期的几年曾经聘请大量的日本音乐教习到中国新式学堂担任乐歌教学工作，故最初开设乐歌课的学堂范围还是比较受限制的，一般在京城的大学堂或各省的省城重点学堂，间或聘请极少数留过学的“海归”来担任教学工作，简谱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日本传过来的。比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介绍的沈心工、李叔同和曾志忞就是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海归”。他们自己编写教科书、编创乐歌，兼教乐理。高低音如何标记，全音符的长音又如何标记，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的短音如何在简谱中记谱等，这些都是他们在教唱乐歌时必须讲清楚的。那个时候的乐歌课一般以唱歌为主，乐理蕴含其中，讲述包括声音的长短、高低、快慢、强弱之记法和唱法。乐歌教学中极少有乐器伴奏，因此被戏称为“赤膊歌曲”。

那时的大学叫大学堂，中学叫中学堂，小学叫蒙学堂，幼儿园称为蒙养院，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学堂才改称学校。习惯上女孩子一般不让上学，直到1907年清政府才公布新教育法破除了这一禁令。同年国家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废除过去师范学堂女子不能入学的规定。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师范教育令》，至此乐歌课在大学、师范、中学、小学、幼儿园普及开来。

学堂乐歌是新生事物，一切都显示了它的新内容和新知识。乐谱不再是宫、商、角、徵、羽，也不再是上、尺、工、凡、六、五、乙，而是阿拉伯数字1、2、3、4、5、6、7，唱成do、re、mi、fa、sol、la、si，而且整个音阶要唱准。其中mi和fa、si和高音do之间还是半音关系，要唱准还是比较有难度的，这就是音阶中的难点。另外，新式的音名C、D、E、F、G、A、B要与之对应。这些西洋乐理的音名和唱名要弄清楚尚需时间；西洋大小调式代替了民族调式，风格完全不一样，是全新的东西；曲调的旋律也多是旋律大小调或者是和声大小调；歌唱也不再是传统的细声吟唱，而是大声歌唱（西洋概念的歌唱就是要大声唱出来）。只有熟悉歌曲的基本情绪，掌握节奏，把握音准、风格，表现歌唱声音之本色，才是自然之道。当然，那时的吟唱性歌唱可能在极其缺乏师资、级别不高的（达不到省级重点的）学堂中，还有极个别存在，那也是在开课初期没有师资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这也并不是说民族的音调就灭绝了，一个都不剩了，还是有极少数的传统音调在学堂乐歌时期被传唱，如《祖国歌》《苏武牧羊》等曲调，它们仍然显示了传统的民族风格和音调特征。

学堂乐歌时期，曾志忞（1879-1929）就是一位以乐理传播为主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人物。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乐理讲解、乐歌教唱、乐理传播及和声的理解上，编写、翻译了不少乐理方面的重要书籍，如《乐理大意》（1903）、《唱歌及教授法》（1903）、《乐典教科书》（1904）、《音乐全书》（1905）、《和声略意》（1905）等。此外，沈心工也有《歌唱教学法》问世。这些书籍不仅对中小学普通音乐教育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中国的音乐体系、音乐教育体系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二)学堂乐歌的活页歌曲之作用——教案**

虽然学堂乐歌的教学工作起步维艰，但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原因是一方面受政府层“红头文件”的影响，有政策的支持、提倡，以及民间的全力配合；另一方面，中国有选曲填词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唐宋两朝就已经确立了，如唐代的“曲子词”就是先有曲子（旋律）后填词。所不同的是，学堂乐歌是选外国之曲填中国之词。

学堂乐歌最初因为歌曲实体形态极为缺乏，故多用纸质活页的形式教学。一首歌曲被填词创作出来，马上有多所学校争而抄之，进而自学之，再而习唱，进而传播开来，这种教学形式延续了较长的时间。后来，人们才将这些具有“开山之功”的“活页歌曲”辑成集子出版。那个时候的书店既有出售活贞歌曲的，也有出售歌曲集的。歌曲集则有“集大成者”之意，如沈心工的180首歌曲用一本大歌集形式出版流传，我们很难想象，以这种方式怎么能够解决等米下锅的问题？！活页歌曲是有一首就用一首，都是自己选曲填词后进行教学的，它既相当于我们现在备课的教案，又相当于PPT，甚至还奠定了我们的音乐教科书的一些基础。其填词过程就等于创作过程，填词完毕即可谓大功告成；前去抄谱、抄词的人，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且是最好的备课过程。

**(三)学堂乐歌唱歌集子的作用——雏形音乐教科书**

可以这样说，纸质活页歌曲形式的学堂乐歌，相当于我们的备课夹、活页纸备课讲义，而歌曲集则就是我们现在音乐教科书的雏形。当然，学习之初，由于大家还不太精通乐理，故有的时候低音音符下面没有加点，高音音符上面也没有加点，或者音符的时值也经常有“不满”或“不足”的情形。还有一些情况是抄谱抄出一些错误来。如，近期贵州省学者、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蒋英新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考》，此书讲的是贵州松桃县的学堂乐歌，其中就有不少原始谱例（全是简谱）是“不完整”的。

学堂乐歌的歌曲集在当时没有教科书的情况下，它起的作用就相当于教科书。在大家苦于无歌可唱之时，有这么一本集子在手，就是丰富的“教材”了。此时，教师有歌可唱，学生有歌可学，岂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音乐教育是一门科学，也讲究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循序渐进是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同时在逐步消化外国音乐知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乐理、歌唱、表演、研究、教学的体系。

**(四)学堂乐歌歌曲题材及表演**

1.题材方面

学堂乐歌解决了当时中小学校开课无歌可唱及唱什么歌曲的问题，也为后来的学校的歌唱教学提供了题材方面的历史依据。整个学堂乐歌时期，大部分乐歌内容是与军事有关的，如用《日本海军》的曲调填词的一些歌曲，又如《国民革命歌》《中国男儿》等。因为学堂乐歌的目的不仅仅是开设一门课程，而是要富国强兵、维护国家主权、免受列强欺辱，所以要让大家努力向前、昂扬向上，培养军人气质，模仿军人姿态，具备勇敢自信、不怕牺牲的精神。又如，沈心工的《体操——兵操》（又名《男儿第一志气高》）也是一个例子，这其中包含有强身健体、保家卫国、建勋立功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歌唱文明生活、歌唱美丽的大自然、歌唱爱情、歌唱新的观点、批判旧的传统等内容。体操—兵操

2.表现方面

学堂乐歌也解决了用什么方式来表现歌曲的问题。学堂乐歌是注意歌曲表演的，在学唱乐歌的过程中，中小学生学会了集体演唱——合唱（当然也包括线性齐唱）这种音乐表演形式，形成了集体歌唱的新传统。学生们既可以唱大合唱，也可以唱小合唱；可以唱四部合唱，也可以唱三部合唱，更可以唱二部合唱，这是学生形成集体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还有表演唱、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等表演形式。与中国民间的民歌独唱、自娱自乐的形式相比，外国人更多的是用歌曲来影响世界、改造人的性格，这是中国以前没有的。这种集体表演的形式实际上也为后来的群众歌曲的迅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群众歌曲在抗战歌咏活动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可谓是鼓舞国民的利器。

学堂乐歌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有筚路蓝缕之功，乐理知识、基本练习、音乐欣赏等内容尽在歌唱之中。可以想象，在乐歌课发展初期应该是以唱为主，兼及乐理和欣赏。这种形式随着音乐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精细，如在1933-1935年间中国出版了一套由黄自等人编写的《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共六集，它包括：普通乐理、音乐欣赏、歌唱基本练习、歌曲（学习歌唱）四部分内容①。书中对课时有非常精确的安排，乐理部分15分钟，音乐欣赏部分15分钟，而歌唱练习部分10分钟，歌曲演唱部分为20-25分钟，偶尔应该也有一定的灵活性，②这是一套相当系统、相当完整的音乐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师范音乐教科书都参考了这套教材系统中的精华部分。现今，我们分而析之，发现学堂乐歌集不仅有雏形教材的作用，培育了我们国家不少的音乐家，而且我们也从中积累了相当多的音乐教学经验和教学资料。学堂乐歌初期虽多是“赤膊歌曲”，但却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音乐语言，其中的西洋大小调式也在大多数情况下代替了中国传统式的、太极式的和谐音乐语言。

学堂乐歌是我国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步，歌曲集的作者多是业余而非专业的人员，出版也比较自由。它是全民参与的活动，无论专业与否，大家都来填词，因为填词多，曲调选择上极为自由，所以难免发生“撞车”行为，张冠李戴者不少，因此才产生了钱仁康的《学堂乐歌考源》，以正视听。当时也有人批评学堂乐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李荣寿说:“不懂作曲，随便作曲”“不知乐式乱填歌词”“歌唱发声不良”“拂风琴纯用单音”,”③等等。我们今天来看，它的历史价值超越了它的艺术价值，这也是学堂乐歌发展之结果。

**二、学堂乐歌教学对中小学音乐教学精神的影响**

学堂乐歌产生于当时西学东渐的大潮之中，也是这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教育的贡献是，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促生了一门新的学科——“音乐”。再进一步，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儿是实现了观念的突破，即实现了音乐不登大雅之堂传统观念之突破，实现了一种对唯利是图的短视心胸的突破。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才真正进人了将音乐教育视为人格完善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种进步阶段。这是否与孔子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有某种不谋而合之处呢?

由于学堂乐歌的普及，不仅学堂充满了朗朗的读书之声，而且过路人也经历了闻所未闻的“集体”童声之清脆、之悦耳、之力量。从过路人都来学唱乐歌，发展到青年学生、整个成人阶层都来唱乐歌，甚至其中的热心人士来选曲填词，教唱乐歌成了一种新的歌唱时尚。我们音乐界已故老前辈廖辅叔先生（1907-2002）在文章中写道，歌曲基本上都是用的“乐歌”这两个字④；作曲家宋扬（1918-2004）在1944年创作的《读书郎》,“小么小儿郎，背着（那）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也显然提到了“学堂”二字，说明学堂与乐歌对那个时代之人的终身之印象与影响；王昆老师（1925一2014）在世之时也津津乐道地讲她在女子学堂中唱《背书歌》的快乐情形……笔者认为，学堂乐歌除了在学理方面、知识方面、身体方面对人们产生影响之外，它还激发了人们对教育精神的美好期望，以及人们对祖国的集体热爱之情，应该将其完全视为学堂乐歌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大影响，也是一种经验和财富。例如，在学堂乐歌早期，日本作曲家小山作之助创作的学校歌曲《宿舍里的旧吊桶》⑤，传到中国来之后由辛汉填词为《中国男儿》，后来又有人填词为《工农兵联合起来》，用以宣传革命；法国儿歌《两只老虎》传到中国后被填词为《国民革命歌》（又名《打倒列强》）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革命的作用，而且类似情况非常之多。学堂乐歌的不足之处是，存在极少数忠君之思想、封建之迷信等方面的思想糟粕。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它更多地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想上的启发，甚至是一次思想解放的运动，如《妇女从军》等歌。

**结语**

学堂乐歌的教学工作被视为近现代音乐教育的起步阶段，它的许多教学经验、音乐知识、教学体系都为我们近现代的学校音乐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近现代的音乐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可资使用的资源。与此同时，学堂乐歌为我们树立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面旗帜，也推开了思想解放的一扇大门。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认为，学堂乐歌开启了新的音乐教育文化发展之道路。

学堂乐歌从大学堂开始逐步下移、普及，成为中小学教育中的必修课（后改名为“唱歌课”或“音乐课”）。学堂乐歌不仅可以传播新的知识，还可以开启新的智慧、新的人生。少年儿童是最可爱、最天真、最纯粹与最纯洁的群体，他们朝气蓬勃、天天向上、努力学习、与时俱进。学堂乐歌不是一个人在歌唱，而是一群人在歌唱，能够培养中小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积极向上的情感，且集体协作、互相帮助的意识亦在此时开始得以培养，使其终身受益。由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人共同开创的学堂乐歌时代，及后来的黎锦晖（1891-1967)）刘质平（1894-1978）、丰子恺（1898-1975）、沈秉廉（1900-1957）等第二批学堂乐歌的教学工作者，编写过的大量音乐教科书，为学堂乐歌的传唱和教学工作推波助澜，并影响了许多音乐家（不仅仅是作曲家），如女高音歌唱家周淑安、男中音歌唱家应尚能等人都有歌曲集出版。同时，学堂乐歌的普及也促成了中国20世纪20-40年代儿童歌曲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之诞生，其功可谓大焉。